

金圣叹

批评本

水浒

上

施耐庵·原著

金圣叹·评改

张国光·校订

戴敦邦·插画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金圣叹批评本

水游
上

施耐庵 原著

金圣叹 评改

张国光 校订

戴敦邦 插画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圣叹批评本水浒 : 全3册 / (明) 施耐庵原著 ;
(清) 金圣叹评改 ; 张国光校订 ; 戴敦邦插画. -- 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7

ISBN 978-7-5502-9180-5

I. ①金… II. ①施… ②金… ③张… ④戴… III.
①章回小说-中国-明代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82039号

金圣叹批评本水浒 : 全3册

作 者 : 施耐庵原著 金圣叹评改 张国光校订 戴敦邦插画

选题策划 : 北京博雅广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策划编辑 : 马兴欢

责任编辑 : 孙志文

特约编辑 : 李森森 赵翠翠

封面设计 : 柏拉图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776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彩插70 36.75印张

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180-5

定价 : 198.00元 (全3册)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 : 010-82894445

前言

不读《水浒》，不知天下之奇。
——金圣叹

350年以前，我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、大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就说：“天下之乐，第一莫若读书”；而“读书之乐，第一莫若读《水浒》。”他又说：“不读《水浒》，不知天下之奇。”而现在我们可以加上一句：不读《金本水浒》，又何以能知《水浒》之奇？

《水浒》最早印行的版本是一百回本《忠义水浒传》，它大约出现于16世纪30年代初。到了17世纪初，苏州又出版了《忠义水浒全传》，它比百回本多了打王庆、田虎的二十回故事。在《全传》本流行大约30多年之后，吴县有一位刚逾而立之年的穷秀才金圣叹(1608—1661)对这部流行小说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。因此，我称金圣叹以前的《水浒》为《忠义水浒》，而称金圣叹批改后的《水浒》为《金本水浒》。

金圣叹在青年时就订了一个评《六才子书》的计划，但他最早着手评改的，却是第五才子书《水浒》。他其实是把《水浒》作为白话文创作的典范予以极高评价的。现存的大约刊行于明嘉靖早年的百回本《水浒》的卷端，原有“施耐庵集撰，罗贯中纂修”这样的题署，但这部《水浒》究竟是施、罗两人同时纂修的呢，还是有一位在另一位的基础上加工而成书的呢？他们两人是师生关系还是朋友关系，或者彼此都没有见过面？如果说“耐庵”是作者之号，那么他的名和字又是什么？这



些问题，各有考证，实无定论。

金圣叹的《水滸》评固然是针对《水滸》而作，但他博学多才，有丰富的文学素养，所做评语不同凡响。他其实是通过解剖一只“麻雀”——《水滸》来讨论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。也因此，他在小说理论发展史上是一位开创性的人物。下面，我们通过《水滸》评对金圣叹的小说理论评述如下：

首先，他强调文学作品有不朽价值。认为：君相能为其事，而不能使其所为之事必寿于世。能使君相所为之事必寿于世，乃至百世、千世以至万世而犹歌颂不衰，起敬起爱者，是则绝世奇文之力；而君相之事反而附骥尾而显矣。

其次，金圣叹小说理论最具有首创意义的是他的典型论。他说：“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，独有《水浒传》只是看不厌，无非为它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。”“《水滸》所叙，叙一百八人；人有其性情，人有其气质，人有其形状，人有其声口……”

此说的高明之处，在于不仅指出作家应画好人物的相貌，要采用富有个性的语言；重要的是指出应刻划出人物的性情，尤其要充分表现人物的气质。所谓“人心

之不同”，应该说首先是气质的不同。金圣叹这样重视“气质”，说明他早已涉足文艺心理学的领域。他主张作家要发掘人物内心的奥秘，展现灵魂深处的奥秘。他把宋江改造成了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，这和原本《水浒》中的宋江截然不同。

其三，金圣叹对小说的情节结构问题也有精辟的见解。有人说：经过金圣叹的腰斩，《水浒》显得紧凑了。我认为不能说得这样简单。还应看到《忠义水浒传》的高潮在宋江排九宫八卦阵、打方腊的那些场面，而金本高潮就前移到大聚义的场面上来了。金圣叹说：“《水浒》写到这里，读之正如‘千里群龙，一齐入海’，更无丝毫未了之感。”而且，经过金圣叹删节的本子，并不是“断尾巴蜻蜓”，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。它可以说描写了各阶层人物，由于不同的被逼原因，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梁山的经历，是写梁山泊起义军逐步聚集并日益发展、壮大的过程。

其四，金圣叹的小说理论，可以说内涵丰富而表现形式也多姿多彩。他除了借用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中的“格物致知”等观念，还从中、印古籍中借用了一些概念来阐述艺术规律。例如，他借用佛学中的“因缘生法”来说明作者应熟悉生活，按照生活的逻辑来反映生活，也就是他说的“设身处地而后成文”。尽管“因缘生法”原本是唯心主义的说法，但我们不必拘泥于它的本义，而主要是看金圣叹借用这一术语所表达的真实思想。他还借用了《孟子》的“动心”说，指明作家在写反



面人物时，也要“亲动心”，要“设身处地”地想一想，这样写出的反面人物，就会栩栩如生。即所谓：“其忽然写一奸雄，即居然奸雄；甚至忽然写一淫妇，即居然淫妇。今此篇写一偷儿，即又居然偷儿也。”

其五，金圣叹根据老庄学说，结合禅宗语录，还提出了“文章三境”说。“三境”就是圣境、神境、化境。“化境”是最难达到的境界。据他说：这样的文章从纸面上看，似乎“无字、无句、无局、无思”，但它却能让读者从无文字处体会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。这种“不写之写”“无声胜有声”的境界，非深知写作三昧者是不能掌握的。

清人王韬说：“《水浒》初犹未甚知名，自金圣叹置之‘才子书’之列，而名乃大噪。”可见，金圣叹是使《水浒》最后定型的批评家，实际上是参与加工、修改《水浒》的重要作者之一；同时，《金本水浒》的评改是很成功的，是《水浒》诸本中思想性强且艺术性高的本子。

张国光

1996年8月1日

金圣叹
原序

原夫书契之作，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其端肇于结绳，而其盛峭而为六经。其秉筒载笔者，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。在圣人之位，则有其权；有圣人之德，则知其故。有其权而知其故，则得作而作，亦不得不作而作也。是故《易》者，导之使为善也；《礼》者，坊之不为恶也；《书》者，纵以尽天运之变；《诗》者，衡以会人情之通也。故《易》之为书，行也；《礼》之为书，止也；《书》之为书，可畏；《诗》之为书，可乐也。故曰《易》圆而《礼》方，《书》久而《诗》大；又曰《易》不赏而民劝，《礼》不怒而民避，《书》为庙外之几筵，《诗》为未朝之明堂也。若有《易》而可以无《书》也者，则不复为《书》也；有《易》有《书》而可以无《诗》也者，则不复为《诗》也；有《易》有《书》有《诗》而可以无《礼》也者，则不复为《礼》也。有圣人之德，则知其故；知其故，则知《易》与《书》与《诗》与《礼》各有其一故，而不可以或废也。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，则有其权；有其权，而后作《易》，之后又欲作《书》，又欲作《诗》，又欲作《礼》，咸得奋笔而遂为之，而人不得而议其罪也。



无圣人之位则无其权，无其权而不免有作，此仲尼是也。仲尼无圣人之位，而有圣人之德；有圣人之德，则知其故；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，此《春秋》是也。顾仲尼必曰：“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？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？”斯其故何哉？知我惟《春秋》者，《春秋》一书，以天自处学《易》，以事系日学《书》，罗列与国学《诗》，扬善禁恶学《礼》，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，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，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，以合为一书，则是未尝作也。夫未尝作者，仲尼之志也。罪我惟《春秋》者，古者非天子不考文，自仲尼以庶人作《春秋》，而后世巧言之徒，无不纷纷以作。纷纷以作既久，庞言无所不有，君读之而旁皇于上，民读之而惑乱于下，势必至于拉杂燔烧，祸连六经。夫仲尼非不知者，而终不已于作，是则仲尼所为引罪自悲者也。或问曰：然则仲尼真有罪乎？答曰：仲尼无罪也。仲尼心知其故，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，于是因史成经，不别立文，而但于首大书“春王正月”。若曰：其旧则诸侯之书也，其新则天子之书也。取诸侯之书，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，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。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侯，其又乌

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！是故作书，圣人之事也。非圣人而作书，其人可诛，其书可烧也。作书，圣人而天子之事也。非天子而作书，其人可诛，其书可烧也。何也？非圣人而作书，其书破道；非天子而作书，其书破治。破道与治，是横议也。横议，则乌得不烧？横议之人，则乌得不诛？故秦人烧书之举，非直始皇之志，亦仲尼之志。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，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，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。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，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。实无其德，则不知其故；不知其故，斯尽烧矣。故并烧圣经者，始皇之罪也；烧书，始皇之功也。

无何汉兴，又大求遗书。当时在廷诸臣，以献书进者多有。于是四方功名之士，无人不言有书，一时得书之多，反更多于未烧之日。今夫自古至今，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，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！烧书，而天下无书；天下无书，圣人之书所以存也。求书，而天下有书；天下有书，圣人之书所以亡也。烧书，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。求书，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。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，其又何所不至之与！有明圣人之教者，其书有之；叛圣人之教者，其书亦有之。申天子之令者，其书有之；犯

天子之令者，其书亦有之。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，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，犹在所不许。何则？恶其破道与治，黔首不得安也。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，犯天子之令，而亦公然自为其书也？原其由来，实惟上有好者，下必尤甚。父子兄弟，聚族撰著，经营既久，才思溢矣。夫应诏固须美言，自娱何所不可？刻画魑魅，诋讟圣贤，笔墨既酣，胡可忍也？是故，乱民必诛，而“游侠”立传；市侩辱人，而“货殖”名篇。意在穷奇极变，皇惜刳心呕血，所谓上薄苍天，下彻黄泉，不尽不快，不快不止也。如是者，当其初时，犹尚私之于下，彼此传观而已，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。殆其既久，而上亦稍稍见之，稍稍见之而不免喜之，不惟不之禁也。夫叛教犯令之书，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，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惮乎哉！其作者，惊相告也；其读者，惊相告也。惊告之后，转相祖述，而无有一人不作，无有一人不读也。于是而圣人之遗经，一二篇而已；诸家之书，坏牛折轴不能载，连阁复室不能度也。天子之教诏，土苴之而已；诸家之书，非缥緲不为其题，非金玉不为其签也。积渐至于今日，祸且不可复言。民不知偷，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；民不知淫，

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；民不知诈，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；民不知乱，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。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，其书破道，非天子而作书，其书破治者，不过忧其附会经义，示民以杂；测量治术，示民以明。示民以杂，民则难信；示民以明，民则难治。故遂断之破道与治，是为横议，其人可诛，其书可烧耳；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，极害于王治也，而然且如此，若夫今日之书，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，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？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，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。而祸首罪魁，则汉人诏求遗书，实开之衅。故曰烧书之祸烈，求书之祸尤烈也。烧书之祸，祸在并烧圣经。圣经烧，而民不兴于善，是始皇之罪，万世不得而原之也。求书之祸，祸在并行私书。私书行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，此汉人之罪，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。然烧圣经，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，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逭也。若行私书，而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，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。

呜呼！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听之则不可，禁之则不能，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？曰：吾闻之，圣人之作书也以德，古人之作书也以才。知圣人之作书以德，则知六经皆



圣人之糟粕，读者贵乎神而明之，而不得栉比字句，以为从事于经学也。知古人之作书以才，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，览者急须褰裳去之，而不得拮拾齿牙，以为谭言之微中也。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，吾知其而今而后，始不敢于《易》之下作《易传》，《书》之下作《书传》，《诗》之下作《诗传》，《礼》之下作《礼传》，《春秋》之下作《春秋传》也。何也？诚愧其德之不合，而惧章句之未安，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。于诸家之书而诚能褰裳去之者，吾知其而今而后，始不肯于《庄》之后作广庄，《骚》之后作续骚，《史》之后作后史，《诗》之后作拟诗，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。何也？诚耻其才之不逮，而徒唾沫之相袭，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。夫扬汤而不得冷，则不如且莫进薪；避影而影愈多，则不如教之勿趋也。恶人作书，而示之以圣人之德，与夫古人之才者，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，观于才子之林者难为文，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。然圣人之德，实非夫人之能事；非夫人之能事，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。彼古人之才，或犹夫人之能事；犹夫人之能事，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。夫古人之才也者，世不相延，人不相及。庄周有庄

周之才，屈平有屈平之才，马迁有马迁之才，杜甫有杜甫之才，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，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。才之为言材也。凌云蔽日之姿，其初本于破核分荚；于破核分荚之时，具有凌云蔽日之势；于凌云蔽日之时，不出破核分荚之势，此所谓材之说也。又才之为言裁也。有全锦在手，无全锦在目；无全衣在目，有全衣在心；见其领，知其袖；见其襟，知其帔也。夫领则非袖，而襟则非帔，然左右相就，前后相合，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，此所谓裁之说也。今天下之人，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，而不知古人用才，乃绕乎构思以后；徒知有才者始能立局，而不知古人用才，乃绕乎立局以后；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，而不知古人用才，乃绕乎琢句以后；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，而不知古人用才，乃绕乎安字以后。此苟且与慎重之辩也。言有才始能构思、立局、琢句而安字者，此其人，外未尝矜式于珠玉，内未尝经营于惨淡，隤然放笔，自以为是，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古人之所为才，正是无法于手而又无耻于心之事也。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、构思以后，乃至绕乎布局、琢句、安字以前以后者，此其人，笔有左右，墨有正反；用左笔不安换右笔，用右笔不安换



左笔；用正墨不现换反墨，用反墨不现换正墨；心之所至，手亦至焉；心之所不至，手亦至焉；心之所不至，手亦不至焉。心之所至，手亦至焉者，文章之圣境也。心之所不至，手亦至焉者，文章之神境也。心之所不至，手亦不至焉者，文章之化境也。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，则是其纸上无字、无句、无局、无思者也。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，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，乃摇摇有局，乃铿铿有句，而烨烨有字，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，才以绕其前，才以绕其后，而非陡然、卒然之事也。故依世人之所谓才，则是文成于易者，才子也；依古人之所谓才，则必文成于难者，才子也。依文成于易之说，则是迅疾挥扫，神气扬扬者，才子也。依文成于难之说，则必心绝气尽，面犹死人者，才子也。故若庄周、屈平、马迁、杜甫以及施耐庵、董解元之书，是皆所谓心绝气尽，面犹死人，然后其才前后缭绕，得成一书者也。庄周、屈平、马迁、杜甫，其妙如彼，不复具论。若夫施耐庵之书，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，面犹死人，而后其才前后缭绕，始得成书。夫而后知古人作书，真非苟且也者。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，废然歇笔，然则其人真不足诛，其书真不足烧也。

夫身为庶人，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，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，条分而节解之，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，已作之书一旦尽废，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，为更奇于秦人之火。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略如此。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，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。

金圣叹
又序

施耐庵《水滸》正传七十卷，又楔子一卷，原序一篇亦作一卷，共七十二卷。今与汝释弓。序曰：吾年十岁，方入乡塾，随例读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书，意惛如也。每与同塾儿窃作是语：“不知习此将何为者？”又窥见大人彻夜吟诵，其意乐甚。殊不知其何所得乐？又不知尽天下书当有几许？其中皆何所言？不雷同耶？如是之事，总未能明于心。明年十一岁，身体时时有小病。病作，辄得告假出塾。吾既不好弄，大人又禁不许弄，仍以书为消息而已。吾最初得见者，是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次之，则见屈子《离骚》。次之，则见太史公《史记》。次之，则见俗本《水滸传》。是皆十一岁病中之创获也。《离骚》苦多生字，好之而不甚解，记其一句两句吟唱而已。《法华经》《史记》解处为多，然而胆未坚刚，终亦不能常读。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，吾于《水滸传》可谓无间然矣。吾每见今世之父兄，类不许其子弟读一切书，亦未尝引之见于一切大人先生，此皆大错。夫儿子十岁，神智生矣，不纵其读一切书，且有他好，又不使之列于大人先生之间，是驱之与婢仆为伍也。汝昔五岁时，吾即容汝出坐一隅，今年始十岁，便以此书相授者，